

英语与香港书面汉语

香港理工大学 石定栩 朱志瑜

提要: 本文描述香港书面汉语受英语影响而发生的变异, 并探讨变异的原因。由于英语的影响, 香港书面汉语的定语越来越长, 而且可以修饰代词; 带“是”字的形容词谓语失去了强调特殊含义, 成了普通结构; 表示时间的从句可以单独用“当”引导; 谓词性结构大量用“及”连接; 偏正结构中的修饰成分出现在被修饰成分之后; 副词性的状语开始担当独立成分, 从而形成同现代标准汉语不同的句法特点。香港书面汉语中不少词的变异用法, 如不及物动词带宾语, 名词当及物动词用, 以及形容词带宾语等等, 也显然是受英语的影响。

关键词: 香港书面汉语、英语影响

[中图分类号] H0_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_0429(2000) 03_0200_7

0. 引言

香港目前的语言环境是所谓的“两文三语”, 即书面语是中文和英文, 而口语则是粤语、英语和普通话三者并行。但在港英殖民统治时期, 英语一直享有官方语言的特殊地位, 在行政、立法、司法、教育等领域独占鳌头。中文的官方地位虽然在1974年得到了承认, 可是直到回归之前, 所有的法律文本都还是以英文的为准。工商贸易活动中, 英语更一直是主要的交际工具。正因为如此, 英语过去是精英阶层的标志, 现在也还是人们取得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英语在香港的“强势语言”(prestige norm)地位还会维持一段很长的时间。

不同语言长期而稳定的接触, 双语人口的不断增长, 必然会引起语言的变化。香港书面汉语受英语的影响, 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 其中最明显的是词汇的变异。除了在汉语中直接夹用的英语词汇和英语缩略词之外, 香港书面汉语中英语音译词、意译词和混合词几乎随处可见。像打吡(derby)、车厘子(cherry)、叉池(charge)、新鲜人(freshman)和唱

片骑师(disc jockey)这类借词, 不懂英语的人就很难猜到其真正的含义; 而波(ball)霸、基(gay)民、骚(show)场之类的混合词, 香港之外的读者恐怕更是莫名其妙了。

语言接触引起的句法变异可能牵涉到语序的排列, 代词、限定词和介词的使用, 以及动词时态、体貌和语气的标记形式等方面(Hoffmann 1991), 而目标语的语序则最容易受源语(source language)的影响而发生变异。

本文主要考察香港书面汉语语序受英语影响而发生的变异, 以及因语序变化而引起的词类转换现象。使用的语料是从1998年9月至11月香港三份影响较大的日报(《星岛日报》、《东方日报》、《明报》)收集的实例。出处标记方式为“报纸/版面/日/月/年”。报纸名称的缩写按汉语拼音, 即M为《明报》, X为《星岛日报》, D为《东方日报》。版面按报纸本身的分法, B5就是B版第5页。所以X/A14/13/10/98/的意思是《星岛日报》1998年10月13日A版第14页。

1. 定语的位置和功用

英语和汉语句法结构的重要差别之一是修

饰语的位置。英语的定语和状语既可出现在修饰对象的前面,也可以出现在后面,具体位置通常取决于修饰语的长度。定语从句则是一个例外,只能跟在所修饰名词性成分的后面,别无选择。这就是形式句法里所谓的“右向分枝”(right_branching) (Odlin 1989, Radford 1997)。而汉语修饰语的位置比较固定,只能出现在被修饰语的前面,不能在后面。定语从句也就只能“左向分枝”(left_branching)了。

分枝方向不同的后果之一是定语从句的长度不同。英语的名词性成分先出现,后面定语从句的修饰作用一目了然。读者或听者一开始就对整个名词结构的形式有了心理准备,一面接收信息,一面等待定语从句的结束。从句的最末成分一旦出现,整个名词结构的界限就确定了,即使长一点也不难理解(Hawkins 1990)。汉语正好相反,定语从句先行,开始时并没有明显的标志,一直要等到“的”字出现才知道原来是修饰名词性成分的。听者要回过头去寻找从句的起点。如果从句过长,结构复杂,信息太多,人的短暂记忆无法容纳,理解上就会出现混乱。所以,汉语的定语从句一般都很短。

王力先生(1939a, 1939b)早就指出,欧化句法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定语越变越长,香港书面汉语在这方面可以说非常典型。像下面两例中的定语,已经长得碍理解了。

- (1) 日复一日,丈夫音讯全无,日前携女千里来港,曾被迫露宿街头的妇人胡爱芹,终感到绝望。(X/A 14/13/10/98)
- (2) 考毕中三评核试,在上水踩单车,被私家车撞倒,拖行一段距离,导致头部重伤,昏迷两三个月才苏醒的一名十五岁少年(X/A 10/22/12/98)

例(1)中受定语从句修饰的是个专有名词,这也是香港书面汉语的特点之一。人名之类的专有名词或代词原先是不能受定语修饰的(王力 1939a),现代汉语的文学作品中偶尔有人会用,但并不常见(刘月华等 1986)。英语的定语从句却不受这种限制,像例(3)和例(4)这样的名词结构十分普通。

- (3) Mrs. Robinson, who is the UN human right

commissioner, said. . .

- (4) He who wishes to speak should do so now.

受英语的影响,香港书面汉语中这类用法越来越多,下面是两个定语修饰代词的例子。

- (5) 平日多说英语的他,在教学时却会引述四书章句。(M/A4/15/10/98)
- (6) 尚有数月便重获自由的他,打算暂时做胶片装饰技工。(X/B18/16/10/98)

香港书面汉语定语的最显著特点,是可以出现在核心词后面,形成右向分枝的名词结构。这种用法的历史很长,现在已成了常见句型的一种,各种用例俯拾皆是:

- (7) 政府未有期限贝里沙离开本国。(X/A6/16/09/98)
- (8) 现在是适当时候推行这项计划。(M/A8/23/09/98)
- (9) 是时候谈谈修辞法了。(M/D9/20/10/98)
- (10) 高层官员是时候按个别能力和表现,重新安排职务。(M/A2/14/10/98)
- (11) 现时尚未是适当时机就集体谈判权立法。(D/A19/05/10/98)
- (12) 她还未到期返回大陆。(M/D1/05/10/98)
- (13) (影视处)昨日首天接到投拆城市电讯广告太暴力。(M/A6/30/09/98)

例(7)是译自英文电讯稿的新闻,原文为 the government has not set a date for Berithar to leave the country,带有浓厚的硬译味道。例(8)至例(13)各句说的都是地方新闻,应该是记者自己写的,因而代表了香港书面汉语的特定规律。例(8)到例(11)显然是仿照英语 it is time to do something 这一句型造出来的汉语句子。不过,英语的定语出现在所修饰名词后面是正常现象,汉语的右向分枝名词结构却属于变异现象,是标准汉语里所没有的。

例(12)说的是“她”还不应该返回大陆,用标准汉语来说,应该是左向分枝的“她返回大陆的限期还没到”。香港书面汉语用右向分枝结构来表达同样的意思,显然同英语的影响分不开。例(13)用标准汉语来说是“关于城市电讯广告太暴力的投诉”,香港书面汉语的右向分枝表达法与“complaint about excessive violence”十分相似,英语的影响显而易见。

2. “是”字结构

英语句法的特点之一是句子的谓语必须由动词短语担任,如果谓语的主要成分是形容词短语或名词性成分,就必须借助“to be”或类似的联系动词。所以例(14)和例(15)中的(a)句都不能说,一定要像(b)句那样加上个本身没多大意思的动词才行。

- (14) a. *They happy.
b. They seem happy.
- (15) a. *John my brother.
b. John is my brother.

现代标准汉语的谓语不一定由动词短语充任,而是可以由以“在”为核心的介词短语或者一般的形容词短语直接担当。有时候形容词谓语句会像例(16)和(17)那样出现在“是”后面,看上去好像同英语差不多。不过,两者的实质完全不同。例(16)中形容词短语后面带了个“的”字,成了“的”字结构的一部分。“的”字结构是指代性质的名词结构,像例(16)里那个“的”字结构就是指人,整个谓语是个真正的动词短语。例(17)里的“是”并非联系动词,而是表示强调的情态动词,通常会重读,全句表示“他”的确确实非常聪明。强调式也适用于动词谓语句,但动词谓语句的强调式有时会像(18a)那样以所谓“是...的”结构的形式出现。(18a)中那个“的”主要用来表示已然,即过去发生的事情,如果像例(18b)那样,谓语表达经常发生或将来才发生的事情,强调式就不再“用”了。

- (16) 他是很聪明的。
- (17) 他是很聪明。
- (18) a. 我是在北京学的英语。
b. 我是明天去北京。

由此可见,现代标准汉语中带“是”的形容词或动词谓语句是所谓的标记形式(marked form),只在特殊环境中使用,表示外加的特别含义。香港书面汉语的特点之一,是将这种标记形式变成了普通形式,像下引例子那样在非强调的情况下自由运用。

- (19) 自由经济是非常重要的。(M/A 8/05/10/98)
- (20) 整篇故事都是真实。(X/B14/09/10/98)

(21) 智利声称,说皮诺切特不享有外交豁免权是荒谬。(X/B11/20/10/98)

(22) 该次行动是符合基本法。(M/D8/14/09/98)

这里的例(20)与(21)特别具有代表性。按照现代标准汉语的习惯,“真实”、“荒谬”这一类形容词很少直接充当谓语,只有同“非常”、“很”等程度副词构成短语以后才具有这种功能。英语似乎很少有类似的限制,“realistic”和“absurd”这此形容词完全可以跟在“to be”后面作为句子的谓语。例(20)和(21)的形容词谓语不用程度副词而用“是”,显然是受了英语的影响。

3. “当...时(时候)”及相关结构

英语和汉语的时间状语都可以是名词短语,也可以是介词短语。但是,英语的从句也可以像例(23)和例(24)中那样,在时间连词“when”或“as”的引导下修饰谓语或整个句子,而汉语的从句要充当时间状语就麻烦得多。由于汉语没有同英语时间连词相应的成分,要表达类似的意思,就只能像例(25)和例(26)那样用“当...时(候)”或类似的结构。

- (23) John was watching TV when Mary struggled with her homework.
- (24) She was busy preparing breakfast as everybody else was sleeping.
- (25) 当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窗花就会变得半透明。
- (26) 在这万众欢腾的时刻,谁还能坐得住啊?

现代标准汉语里的“当”和“在”都是介词,而汉语的介词宾语不能是从句,只能是名词结构。如果表示时间的是从句,就只能让从句去修饰名词,形成一个复杂名词结构,再跟在介词后面作宾语。由于名词短语本身也可以充当状语,所以有时候可以像例(27)那样将介词省去,而保持原意思基本不变。

(27) 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窗花就会变得半透明。

这样一来,单从以从句表示时间的角度来看,英语和汉语的表达方式正好相反,前者是在从句前加个标记,而后者是在从句后加个标记。王力先生在讨论汉语欧化倾向时曾指出,如果

把“当”或“在”作为纯然欧化的时间连词,那么后面的“...时”,“...的时候”就不应当出现。不过,就当时情况而言,“欧化还没有达到这一个阶段”(1939a: 471)。有意思的是,这种形式在香港书面汉语中已经十分常见了:

- (28) 当金融市场被造市者操纵,自由市场便不能如常运作。(X/A12/15/09/98)
- (29) 当经济好转,楼价会上升。(D/A1/30/09/98)
- (30) 在国庆日假期结束,澳门司警昨日凌晨展开一次特别行动。(X/A15/04/10/98)

香港书面汉语里的“当”或“在”是否已经变成了时间连词,现在似乎还不宜随便下结论,但在这一变化过程中的作用,则实在不容忽视。

4. 连词“及”

香港书面汉语中并列结构的用法也有了一些变异,英语在这方面的影响则较为微妙。并列在两种语言中都是常见的句法结构,而且连词的数量也都不少,差别主要在于连词的使用方式。

英语的并列方式是所谓的形合(hypotaxis),即一定要使用显性的连接标记,而汉语体词的并列方式可以是形合,也可以是意合(parataxis),即简单地排列在一起,不用任何显性的连接标记。英语的“father and son”在汉语里既可以说成“父亲和儿子”,也可以说成“父亲儿子”或者“父子”。汉语的谓词性成分之间在并列时很少用连词,而英语的并列动词或形容词之间则一定要用连词。汉语的“唱歌跳舞”只能用英语的“sing and dance”对应。

王力先生(1939a)曾经指出,由于受到英语等欧洲语言的影响,汉语中“和”、“而且”、“又”等连接成分的出现频率在逐步增加。在这方面,香港书面汉语的表现十分突出,不但并列体词成分的形合连接方式已经成为主流,而且谓词的并列也变得以显性形式为主了。下面是一些典型的例子。

- (31) 菲律宾驻港总领事馆...认为(此)建议不公平及歧视。(M/A7/30/09/98)
- (32) (罪犯)引诱及协助非法移民。(D/A1/05/

10/98)

- (33) 会引致出现“同工不同酬”的情况及造成分化,会大大影响到公务员体系的稳定及打击公务员士气。(D/A19/05/10/98)
- (34) 要求他们在下月二十三日撤离(该)中心,及到法庭应讯。(X/A16/08/11)

上引各例句中进入并列结构的都是谓词性成分,类似的并列结构在标准汉语里通常会采用意合形式,而不会使用显性的连接成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标准汉语里“及”的性能很特别,不但只能连接体词性成分,而且一定表示并列成分在“及”前面的比在后面的要重要一些(吕叔湘 1984: 250)。这里的“及”连接两个谓词成分,而且并不表示前重后轻。香港书面汉语里的这个“及”似乎是英语“and”的翻版,而不是标准汉语的连词。

5. 偏正复句中偏句的位置

偏正复句在英语句法中一般称为主从复合句,是英汉两语言中都很常见的句型。两种语言的差别主要在于主句和从句的顺序。英语的15种状语从句中(这里将时间状语从句分为前时、同时、后时3种),通常出现在主句之前的只有两种,主要出现在主句后面的有6种,其余7种则是两种语序均可的(Quirk et al. 1985: 1078_1117)。汉语偏正复句最常见的顺序是前偏后正。前正后偏的形式近年来虽然时有所见,但用法上有较大的限制,通常只用来表示追加,带有补充解释的意味(赵恩芳,唐雪凝 1998)。

香港书面汉语似乎并不受这种限制,正常情况下也常常会出现前正后偏的顺序。下面是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 (34) 雇主将不会增聘新全职雇员,如果他们经济前景看淡。(X/B7/09/10/98)
- (35) 惩罚会是温和的,除非藐视克林顿的言论是出自高层军官之口,抑或广泛传闻。(X/A6/21/10/98)

同样的意思如果用英语表达,条件从句和让步从句也多半会出现在主句后面,香港书面汉语在这方面显然更接近英语。这种前正后偏

的用法还波及了一般的状语。如下面两句里的让步状语,跟在整个句子的后面,作为追加成分,在现代汉语中十分罕见,但在香港书面汉语中却相当普遍,这显然是受英语影响的结果。

(37) (弟妹)大多不用她们照顾,无论学业或生活上。(X/D7/23/10/98)

(38) (针对香港经济的投机炒作)本地炒家同样有份,不论直接地还是间接地。(M/D8/14/09/98)

6. 独立成分

独立成分是指那些同句子没有直接的结构关系,但却出现在句子首尾或夹在句子中间的外加成分。常见的独立成分之一是插入语(吕叔湘,朱德熙 1951),即例(39)中的“请恕我直言”之类。这种成分又叫“插语”、“准插语”(王力 1939/1984a: 448),“插说”(刘月华等 1986: 405,叶南薰 1987: 50),意思都是说此类成分自成一体,与所在句子没有直接关联,只是用来表达说话人的态度或对所说内容的评价。

(39) 如果二十来个字母都认不清,请恕我直言,那么,化学也大抵学不好的(鲁迅)。

现代标准汉语的插入语大多是完整的从句或动词短语,多半以表达类动词为谓语的核心,如“看起来”、“毫无疑问”、“说实在的”、“老实说”、“据说”、“相传”、“据报道”、“总的说来”、“简而言之”,等等。有时候也会用单独的名词结构,主要是那些可以充当表达类动词宾语的,如“一句话”、“实在话”及“北京人的说法”等(叶南薰 1956)。

在香港书面汉语中,如果要表示说话人的态度,常常会使用一种比较特别的独立成分,下面是一些典型的例子。

(40) 不幸地,史密斯议员...又在抹煞参议员默里的佳绩。(X/A4/25/09/98)

(41) 讽刺地,施政报告可供批评的地方其实不多。(M/D8/12/10/98)

(42) 电影无人看,却讽刺地出现很多为电影业服务的机构和活动。(X/A28/22/10/98)

(43) 明显地,我们还须做一点事情,以便向总统展示力量。(X/A7/15/09/98)

(44) 很明显的,未来是个要由(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解决的问题。(M/A11/16/10/98)

这些例句中的句首成分“明显地”,“讽刺地”和“不幸地”等等显然表示说话人对句中内容的评价,又与句子没有直接的语义或结构关系,分析成插入语应该是可行的办法(参见李忠初 1998)。不过,由于形式上的差别太大,将这种成分看成插入语并非没有问题。另一方面,这种成分带有明显的状语标志“地”,似乎也可以分析为另一种独立成分,即所谓的评论性状语(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 1984),就像例(45)句首的“奇怪”那样。评论性状语同句子中的动词在语义上也没有直接关系,同上述句首成分倒是十分相像。

(45) 奇怪,连个人影都没有。

然而,例(45)的句首成分虽然叫做状语,但并不具有状语的形式,而且在语义上是对整个句子作出判断,如果换一种表达形式,应该像例(46)那样用个判断性的动词结构,而不会像例(40)那样采用典型的状语形式。

(46) 奇怪的是,连个人影都没有。

事实上,香港书面汉语中的这种用法更像英语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plainly*, *ironically* 之类副词的用法。英语的这些副词多半出现在句首,以逗号与全句分开,一般称作“外加语”(disjuncts),以与同为状语的“附加语”(adjuncts)和“联加语”(conjuncts)相区别(Quirk et al. 1985: 501-503)。“外加语”的作用是对后面整个句子表达的内容或方式予以限制或评述,主要由以 *ly* 结尾的副词担当,因此“外加语”又称“句副词”(sentential adverbs)(Richards et al. 1996: 10-11)。以 *ly* 结尾的英语副词通常会翻译成由汉语“地”为标记的状语,但是标准汉语中带“地”的状语同动词的关系都比较紧密,一般不能作为独立成分(参见刘月华等 1983)。所以,说香港书面汉语的这种独立成分更像英语的句副词,并不过分。

7. 词汇转类

香港书面汉语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许多词

汇的用法与现代标准汉语不同。一般说来,汉语缺乏表示词类的形态标记,从形式上很难判断词的类别。要划分词类,一般只能以词的句法功能为主,辅以语义和其它一些标准(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 1984)。不过,这不等于汉语没有词类,也不意味着词与词之间没有功能及用法上的区别(胡明扬 1995)。同其它语言一样,现代标准汉语中任何一个词的用法在某一特定时刻都是相对稳定的,而新的用法在没有被大众接纳之前,就只能当作变异。香港报刊书面汉语中词类的变异相当突出,最典型的例子是“现代化”、“合理化”、“复杂化”这类“形容词+化”形成的动词了:

- (47) 北爱尔兰和平协议今年四月才签署,而诺贝尔和平奖早于二月一日便截止提名,复杂化了本届竞逐的情况。(M/B20/16/10/98)
- (48) 一些外僱雇主以极为歧视的措辞指责外籍佣工...从而合理化减外佣薪酬行为。(M/D5/20/10/98)
- (49) 这么一来...更合理化了所有减薪恶行。(M/D5/20/10/98)

按照现代标准汉语的习惯用法,由单音节形容词加“化”构成的复合词可以带宾语,是及物动词,而由双音节形容词加“化”形成的动词是不及物的,不能带宾语(吕叔湘 1984: 239-240)。香港口语和书面语中常常出现所谓的“语码混用”(code mixing)现象,即汉语中夹用英语单词,并且沿用英语词的一般用法而不照顾汉语的习惯。在夹用 to modernize 或是 to justify 之类的动词时,就会形成“去 modernize 城市交通”之类的说法(Li 1996: 108)。如果在转回汉语时不注意,或者干脆照搬英语的语序,就很容易造出“去现代化城市交通”这样的结构。

其它不及物动词用作及物动词的例子在香港报刊上也不少见:

- (50) 她否认偏私个人著作。(M/A 11/17/09/98)
- (51) 菲航职员没有主动接触我。(X/A4/18/09/98)
- (52) 父亲会从北京飞往广州会合他们。(X/A 28/09/10/98)

这里的“偏私”、“会合”等词在现代标准汉语里通常只用作不及物动词,而“接触”在表示“联络”义时也不作及物动词。这三个词在香港报刊中的用法不像现代汉语,而像英语的及物动词 to favor, to contact, 以及 to join。受英语影响而造成的词汇转类,在香港书面汉语中还有不少。例如:

- (53) 他们周一清晨叫醒总理内塔尼亚胡,简报这次袭击。(X/A6/10/10/98)
- (54) 父母没有必要把第三者标签成罪大恶极的坏人。(M/D7/19/09/98)

汉语名词有时候会变成其它词类,但在转类时最大的可能是成为非谓形容词,其次是一般形容词,作及物动词的可能性最小,也最不易为一般人所接受(胡明扬 1995, 李宇明 1996, 张伯江 1994)。上面两例中的“简报”和“标签”在现代标准汉语里都是典型的名词,很少见到有转类的用法,更不会当及物动词用。而相应的英语名词 brief 和 label 都能同时充当动词,而且是及物动词。香港书面汉语中这两个词的用法显然同现代标准汉语关系不大,而是直接套用了英语对应词的用法。套用英语对应词的功能似乎是香港书面汉语的常见现象,下面是一些形容词方面的例子。

- (55) 她明显恼怒莱温斯基。(M/A16/20/09/98)
- (56) 百分之十五的人说害羞购买(某物)。(M/A17/06/11/98)
- (57) 他不忧虑和平而理性的游行会出现混乱的场面。(D/A20/01/10/98)

现代汉语的形容词大部分不能带宾语(刘月华 1983: 122),为数不多的“形容词+宾语”结构主要是古汉语遗留下来的使动用法,加上极少数修辞意味很强的对动或意动等用法(李泉 1996: 182)。上面几例中形容词的用法既不是使动用法,也不是对动或意动。例(55)的“恼怒”并不表示“触怒”或“激怒”,整句的意思是“她因莱温斯基而感到恼怒”。例(56)中的“害羞”也不表示“使...害羞”,而是表示“对购买这种东西感到害羞”。相应的英语形容词短语 to be angered with, to be ashamed of 或 to be worried about 及其宾语的顺序倒的确是这样的。

从语序的角度说,香港书面汉语中形容词的这种用法同相应英语形容词十分相像。下面的例子也是如此:

(58) 他有信心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将有一番新作为。(M/B3/28/09/98)

(59) 声明表示,有信心该地区可克服国际市场不稳定所带来的困扰。(M/B4/28/09/98)

英语中有相当一部分形容词,如 confident, convinced, sure, certain 之类,后面可直接跟一个以 that_ 为引导词的从句。而对应的汉语动词或形容词,如“有信心”、“相信...”、“肯定”等,则有不同的句法特性。“有信心”后面可以像例(60)那样跟另外一个动词,形成连动结构,但却不能直接带从句做宾语。当然“有信心”在语义上可以有从句宾语,但这种宾语只能像例(61)那样以介词宾语的形式出现。

(60) 我们有信心维持人民币的汇率不变。

(61) 我们对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很有信心。

例(58)和(59)中“有信心”直接带宾语从句显然不是标准汉语的习惯用法,而是照套了英语形容词带宾语从句的用法。

8. 结语

香港为研究语言接触提供了极好的社会环境,香港书面汉语为研究语言接触而引起的语言变异提供了最佳素材。英语的长期统治地位,社会上语码混合现象的普遍存在,以及英语借词的大量进入,都是香港书面汉语产生变异的直接动因。语言的发展变化是永恒的,有变异并不足奇。重要的是对变异有清晰的了解,对语言的不同形式共存有正确态度,既看到语言发展的必然性,又看到维持语言稳定在交际中的重要性。这也就是本文的基本观点。

参考文献

- 胡明扬, 1995, 现代汉语词类问题考察,《中国语文》第 5 期。
——(主编), 1996,《词类问题考察》,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李泉, 1996,“形+宾”现象考察[A],《词类问题考察》,胡明扬(主编), 168—189 页,北京语言学院出版

社。

- 李宇明, 1996, 非谓形容词的词类地位,《中国语文》第 1 期。
李忠初(主编), 1998,《现代汉语纲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刘月华、潘文娉、胡韦, 1983,《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吕叔湘(主编), 1984,《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
吕叔湘、朱德熙, 1952,《语法修辞讲话》,北京:开明书店。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 1984,《中学教学语法体系提要》。
王力, 1939a,《中国语法理论》,商务印书馆(1984a《王力文集》第一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39b,《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1984b《王力文集》第二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张伯江, 1994, 词类活用的功能解释,《中国语文》第 5 期。
赵恩芳、唐雪凝, 1998,《现代汉语复句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叶南薰, 1956,《复指和插说》,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87 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再版)。
Hoffmann, C. 1991. *Introduction to Bilingualism*. New York: Longman.
Hawkins, J. 1990. A Parsing Theory of Word Order. *Linguistic Inquiry* 21/2: 223-61.
Li, David C. S. 1996. *Issues in Bilingualism and Biculturalism*. New York: Peter Lang.
Odlin, T. 1989. *Language Transf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Quirk, R., G. S., G. Leech & J. Svartvik. 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Essex: Longman.
Radford, A. 1997. *Syntactic Theory and the Structure of Englis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ichards, Jack C., Platt, J & H. Platt. 1996. *A Dictionary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Essex: Longman.

收稿日期: 1999—12—9

通讯地址: 香港理工大学 CBS

derstand their perspectives and ideas. “Native concepts” are those which are used frequently by the participants to express their views of the world and are charged with their emotions. Using “native concepts” to analyze data can not only help the researcher enter the mind of the participants, to understand their way of thinking and meaning making, but also provide useful leads to the overall analysis of research findings. The in_depth exploration of “native concepts” also indicates the researcher’s attitude, i. e. to overthrow the existing monopoly of the academia, and to let the voices of ordinary people into the arena of “scientific research”.

English influence on Hong Kong written Chinese, by *Shi Dingxu & Zhu Zhiyu*, p. 200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describe changes in Hong Kong written Chinese that are due to English influence and to find out the factors that brought about the changes. The changes include excessively long relative clauses, non_emphatic *be* to lead adjectival predicates, the preposition *dang* being used in the same way as the English *when*, modifiers coming after the modified, adverb phrase being used as disjuncts, and nouns, adjectives and intransitive verbs being used as transitive verbs.

Improving English through writing, by *Wang Chuming, Niu Ruiying & Zheng Xiaoxiang*, p. 207

This paper reports on a one_semester_long experiment on improving Chinese-speaking EFL learners’ English by means of composition_writing. The subjects consisted of 201 English majors in their first year of study at Guangdo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heir compositions were scored against four criteria: length, organization, ideas and language, with length receiving the heaviest weighting. Only good points related to the four criteria were marked with a view to boosting the subjects’ confidence in their ability to learn English. Responses to a questionnaire show that the subjects welcomed the new method and consequently felt more confident in their own writing ability and in their use of English.

A study of the feasibility of prewriting in teaching composition, by *Wu Jin & Zhang Zaixin*, p. 213

The writing process consists of three stages: prewriting, writing and revising. Based on connectionism, this article proves the feasibility of prewriting in theory. In addition, an experiment and a survey serve to validate the rationale interpretation. It is argued that the traditional product approach and the more recent process approach can be integrated into a new prose models approach to teaching English composition in China.